

● 儒家文化

儒家思想的传者本位回归与超越

闭伟宁¹, 高翔²

(1. 武汉大学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2.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闭伟宁(1963-), 男, 广西天等人, 武汉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哲学与社会学研究; 高翔(1967-), 男,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系硕士生, 主要从事哲学、新闻传播学研究。

[摘要] 儒家传播思想, 是我国古代思想宝库中的一份非常重要的遗产, 影响深远, 衣被中华数千年。在人类迈向21世纪、世界各种文化相互冲突、融合的时候, 探索儒家传播思想对东西方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儒家传播思想的考察, 既要历史地回顾儒家传播思想对世界的影响, 又要阐明儒家思想在当今以及未来的价值。揭示出儒家传播思想的产生发展的“传者本位”——“受众本位”——“回归的传者本位”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过程。

[关键词] 儒家思想; 东西方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 传播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3-0288-05

传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现象, 是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人类世界是一个由多元文化组成的社会, 各种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的交流、沟通和互动, 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中国文化是人类古文化中从未中断延续至今的一种文化。而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 影响深远, 衣被中华民族数千年。儒家思想不仅是我国古代思想宝库中的一份重要遗产, 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构成, 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为中国、东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儒家传播思想的特征

马克思曾说过, 各种观念、范畴是对一定社会关系的抽象。“所以, 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1] (第539页)。儒家传播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 也有其自身演进的逻辑过程。儒家传播思想的核心是传播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 借助传播以实现对道德的规范, 影响社会舆论, 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虽然这些传播思想在某些方面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 也并非独立的传播理论体系, 但它涉及传播与为政、传播与人际关系、传播与个人修身立命、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诸多方面, 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播文化上的一种折射。分析儒家传播思想的精神实质可以归结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 强烈的人格意识和人文精神 儒家认为, 传者先进行内省、反思, 修行品德, 然后参与社会传播, 亦即先人后己。传者其身越正, 传播的可信度越大。这既是对传者的要求, 也是每个社会成员参与传播的起点。孔子说: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2] (第564页), “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3] (第788页)? 孟子在传播上也十分重视传者的修养, 在传播活动中所应保持的人格, 认为“说大人, 则藐之, 勿视其巍巍然”^[4] (第339页)。对传者的知识修养, 他的主要观点是“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5] (第882页)。朱熹根据孟子的“性善论”将“仁”与人性沟通起来。他说: “论天地之性, 则专指理而言; 论气质之性, 则以理与气杂而合之”^[6] (第

321页)。这种传播文化对于促使现世的人们奋发有为、追求进步是有帮助的。

(二)以“仁”为核心的浓重的情感主义倾向 儒家认为,传播就是通过对伦理道德的规范,来维持人际关系的等级关系,恢复和巩固社会秩序。儒家认为,社会传播的基本原则是“仁”、“义”、“礼”、“信”等等,而以“仁”为核心。在孔子看来:“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2](第136页)?“仁”是为人之根本,有了“仁”的修养,才可以传播其“道”。孟子将孔子的“仁”学思想发展成为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地主阶级政权服务的政治纲领——“仁政”学说,也提倡“仁者爱人”。他主张广泛地传播“善教”,从而激活人性深处的羞恶、恻隐、仁爱之心,使人的行为符合王道政治的秩序。他提出的“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参与社会传播和交际者的最基本的修养和出发点,也是社会传播的基本原则。这些思想,对医治现代社会的一些“社会病”,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以“礼”为主的强烈的控制约束色彩 儒家一方面强调以“礼仪”来调整社会关系、磨合社会矛盾,如孔子的“可与言而不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2](第211页)。一方面强调用诛杀的办法来压制异端舆论,从而达到实现社会安定的目的。这在荀子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4](第44页)。在荀子看来,错误的舆论比武装犯上的“盗贼”还可怕。西汉大儒董仲舒则谏言:“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5](第456页)。这为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提供了重要根据。

(四)强调实效和注重人际关系 儒家思想的一大特色就是强调整体意识而较少倡导个人主义,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儒家思想的传播的方式上。孔子强调的是“实”,即内在的涵蕴要真实可靠,符合周礼,而反对“巧言令色”。在舆论传播中,孔子反复申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第56页)。孟子强调不亢不卑,平交王侯,表现出一种傲岸的人格尊严。荀子则强调要以美丽的形式去打动受众,有时甚至不妨迎合受众的心理。所谓“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4](第41页)。在儒家代表人物中,孔子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孟子洋洋洒洒,巍然好辩;荀子哗众取宠,咄咄逼人,表现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和个性,对后世传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传者本位的确立:儒家传播的辐射力及其影响

“传者本位论”在先秦儒家思想传播中可以说是比较突出的。大众传播研究分“传播者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等五个领域。其中居中心地位的是传播效果问题,因而“传播效果分析”也是传播研究最集中、成果最丰的领域^[6](第151页)。在先秦,虽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由某一政治集团或由政府机构所控制的传播事业,但却广泛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传播活动。这些传播活动保障了社会的整体控制与局部整合,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社会传播的活跃,又必然产生与之相应的传播思想,儒家传播思想从先秦的孔孟到汉代的董仲舒、贾谊,再到宋明的程朱理学,为适应封建统治阶级不断变化的需要,从传播的内容、传播的形式上都有很大的改变,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历代的儒学大师都着力对儒家文化价值理性进行诠释和发挥,使“天人合一”、“人伦有序”、“仁义礼教”、“大同社会”等抽象的价值观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对维系人伦关系和社会秩序,稳固政治统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使“传者本位论”占据主导地位,以传者为中心的传播活动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到汉唐盛世,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华文化传播在日本、朝鲜、越南以及其周边地区发生深远影响。孔子文化南下越南,东渡扶桑。公元1世纪,汉人把儒学传到越南。公元11至12世纪,朝廷正式在越南兴办儒学学校,建立孔庙和实行儒学科举制度。明朝初年,朝鲜就于汉城创设成均馆、祭孔文庙。李氏朝鲜尊崇儒学,国家设成均馆,郡县置乡校,李朝政府积极发展儒学教育,促进了文化、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儒家传播思想对日本社会和文化影响也很深,尤其在江户明治维新时,突出儒家精神和孔子思想。对日本人的民族精神要辩证地看,它不光是自立自强而是要称雄乃至独霸亚洲;日本民族自古至今都在不断地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东西,经过改造为己所用并超越对手。它吸收中国儒学的精华让其为巩固政权、协调社会和人关系所用,并让其与西方的科学技术结合,最终超越了中国。

16世纪末、17世纪初儒家思想通过传教士的渠道西行欧洲,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中国文化又西渐欧洲,向西方展示了一种与基督教文化完全不同的东方文明,对当时造成很大震动的《论语》、《周易》及许多中国文化典籍都被译成西文在欧洲传播。儒家传播思想就其特殊形态而言,既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宗教文化与社会伦理,也不同于康德的义务伦理,甚至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也不完全相同。它是一种东方式的传播思想,具有中国文化背景。这种介于宗教与世俗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传者本位特征启发了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法国百科全书派重要代表人物霍尔巴赫(P. H. D. Holbach)赞美中国是惟一把政治的根本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主张以儒家道德来代替基督教,强调“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社会的体系》)。狄德罗(D. Diderot)盛赞中国文化,认为

《五经》是中国最初而最神圣的读物。《四书》则为《五经》的注释。认为孔子的学说以行为为主,不要暴力和迷信,强调以道德、理性治天下。赞美中国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儒家的道德哲学。伏尔泰(F. M. Voltaire)极力赞扬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传播思想的价值。认为中国文化是《圣经》以前、《圣经》以外的文化,这种文化与基督教完全不同。指出基督教是虚伪的、迷信的,宗教的迷误和教会统治是人类理性的主要敌人,一切社会罪恶都源于宗教蒙昧主义。伏尔泰认为儒学是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向往中国的理性道德,接受儒家的性善说。狄德罗、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推崇孔子,赞扬中国文化,表明儒家传播思想对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也是儒家学说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三、从传者本位走向受众本位:儒家思想的否定过程

“传者本位论”片面强调传播者的强势地位,以传者为万能,视受众如“群氓”,这是一种对传播效果的绝对化和“过于简单”的描述。拉扎斯菲尔德的“两极效果论”等理论新发现,为“受众本位论”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传播的效果如何,最终都会在受众身上得到体现。因而,儒家传播思想的强势地位,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自身局限性和受众反应的制约,当这种受众反应的制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挑战也就来临了。

从先秦时期开始,在诸子百家起而论战时,儒家传播思想就遭到了种种责难和非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大行文化专制主义,“孟子党徒尽矣”。两汉时期,随着儒学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后,不管人们自觉与否,自愿与否,它就成了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因而它的修养意义和作用就大大地被减弱了。这样,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这种危机直接导致了儒家在传者本位方面发生倾斜。汉代末年,政治制度化的儒学礼教(名教),一方面成为束缚和压制人的自然感情的东西,一方面又成了那些伪君子沽名钓誉的工具,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玄学乘机而起,调和名教与自然(性情)的矛盾,而其中又都强调以“自然”为本。并且在理论学说上,玄学也明确地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所以,自从玄学诞生以后,儒学尽管在政治制度层面仍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修养层面的功能,却已为玄学或道家(以及道教)所取代。东晋南北朝以后,以至于隋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影响又超过了玄学,在士大夫的思想修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末的约700年间,儒学只有那些体现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东西,在统治阶层的维护下继续起着作用。

宋代儒家伦理在实践中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形成产生许多负面影响。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跨到社会主义阶段,家长制一言堂、惟我独尊、人治大于法治的封建余孽每每可见。在韩国和日本,君主独裁人民盲从而导致的悲剧也不时地上演。日本在二战期间扩张之心迅速膨胀,四处侵略,出于对天皇的效忠,日本国民推波助澜给予这种侵略以最大支持。可见,“君为臣纲”的中央集权制所导致的家长式的独裁统治,能给国家和民族利益带来许多弊端甚至严重的灾难。宋代理学家特别是二程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一出,中国乃至东亚盛行男尊女卑,都同样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

传播是一个传受双方沟通、交流信息的双向反馈的信息流通过程。传播是以传播效果为中心的,而传播效果又以受众心理为作用点,要想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受众需要是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儒家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进,就逐步失去了传播中的主导地位。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解体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儒学在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冲击下,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在此历史背景下,儒家思想逐步由传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化。其转化的过程,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与“尊孔”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在五四新青年看来,中国的首要之务是“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信仰,对于此新国家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寒不流,不止不行”^[7](第79页)。到了20世纪30年代,产生了全盘西化的激进的文化论者,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达到了极至,陈序经和胡适为最突出。陈序经提出:“全盘和彻底的西化,使整个中国能够整个的西化,这是我的本意”。胡适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虽然没有陈序经那么激进,同样指责传统文化,他说:“文化固有一种惰性,全面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接受这个新世界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文化本位……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

四、回归的传者本位:儒家思想的否定之否定的完成

“受众本位论”也是有其理论缺陷的。一方面,它认识到受众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它又无法提

出提高传播效果的行之有效的办法,陷入两难境地。“受众本位论”在对“传者本位论”辩证否定的同时,也抛弃了其中一些好的东西,如传者的自身定位的明确性以及传播目标的明确性等,“受众本位论”需要一个新的理论飞跃。可以认为,“回归的传者本位论”是在新的条件下传播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宏观上,以传者为传播活动和传播理论研究的中心,传者在实施传播活动的时候,优先考虑的是自己究竟具有什么“核心优势”、“核心产品”,“知己”是第一位的;而在微观上,传播活动的顺利进行就应当以受众为中心,弄清受众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信息,什么样的传播方式最能为受众所接受,究竟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传播效果。对宏观层面的忽视可能造成传播活动的盲目性,对微观层面的轻视则可能造成“对牛弹琴”的传播效果。儒家思想在传播过程中也是在不断吸收、继承新的思想,不断进行从传者到受众,受众反馈给传者的发展过程,应该说,从儒家思想的受众本位到又一个传者本位的出现,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过程,而是一个新的否定和超越。

我们把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史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虽然儒家伦理的现代形式在与西方哲学的相遇中已发生了变化,却没有经历一个抽象化的过程,总的说来,它仍然是一种基于社会的美德伦理学,即它不是孤立地看人,而是把人放在关系语境,包括整个宇宙的语境中来看待。在儒家伦理中我们也看到了普遍性的特征,如“以天下为己任”,或“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也看到了理性原则,它们强调的不是抽象原则而是具体的行为和修养:关爱、仁慈、克己、重人伦和社会和谐。因此,儒家思想可以被归结为一种温和的(美学的)普遍主义而与西方强硬的(理性的)普遍主义相对。儒家传播思想具有的多元政治品质使其既强调以道名分等级观念,提倡对社会等级秩序的理论维护,又包含着要求统治者必须考虑人民生活的忧与乐、不同的社会阶级都应具备双向的道德责任等朴素的民族思想。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统治历史中,统治者利用儒学为其合法性统治提供思想依据,因而儒学中重视礼制秩序这一方面被一再拔高,而无视或扼杀其民主性的另一面。尊卑上下的礼治思想在汉代演化成“三纲五常”的政治意识形态。汉代之后随着君主集权主义的日趋巩固和加强,“君尊臣卑”的政治格局不仅为后世的统治者忠实地奉行,而且不断地加以强化。历史行进至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在暴露专制王权处理全新的内外形势时的因循颓废的同时,也使忧时的知识者逐渐触及西方先进技术背后存在的制度和思想资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儒家传播思想中湮没已久的民主性因素被激活,而又反过来成为主动吸纳四方政治思想,呼吁变法维新的知识背景。西方政治思想在当时的传播,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调整和更新提供了触媒的契机。通过取鉴西方民主思想,传统儒家思想自身开始了自我扬弃的过程,它一方面展示了对意识形态化的儒学的清理和批判,另一方面进行着自我的政治性格与文化性格的近代化整塑。而这一过程,正是儒家传播思想辩证否定的过程,促其完成儒学悠久思想传统的内部转换。

面向新世纪,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优秀文化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并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儒家传播思想作为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它与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也正在越来越为世界有识之士所瞩目。王国维有一句名言:“余谓中西之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这是很深刻的学术文化见解。其实质思想是传播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从传播学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关系实际就是完成一次完整的传播的过程。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儒家传播思想无疑称得上民族文化主体之一,在她长期的演变发展过程中,既有本民族间不同思想学派的相互吸纳,也有和外来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不过这种融合仍然是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础,从传者本位出发,对某些外来文化进行改造,有时甚至是被彻底地批判,走向受众本位,而最终是要回归传者本位,完成一个自身完善的过程,她是一种适合于本民族需要的深层次的融合,而不是简单地加在一起。当然,要获得这种发展的前提,首先要求儒学有一种开放的精神,既要继续吸收和融会本国各学派的精华,更要积极吸收和融会西方文化的精华,同时还要对儒学自身已有的基本精神和重要概念、命题等,“择其善者而明用之”^[2](第88页),作出符合现代社会精神的新诠释。从儒家传播思想传者本位的回归,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对东西方文化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是一种精英儒家文化。近代特别是现代以来,随着东亚(被称为儒家文化区)现代化进程的展开,“日本奇迹”、“汉江奇迹”和港台地区、新加坡的经济腾飞,人们开始认识到儒家传播文化的价值理性。未来学家卡恩认为,整个东亚地区经济上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大多数经济组织受儒家传统即“后期儒家文化”的熏陶而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质。

我们肯定儒家传播思想有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价值,并不等于说儒家文化完美无缺。事实上,儒家思想中确实存在不少对现代社会发展不利的因素,即使是具有上述的精英儒家文化的理性优势,也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在传统社会里,儒家传播思想可以成为束缚人与社会发展的教条;在现代社会里,经过从传者到受众的转变,最终回归传者本位的历史演进过程,儒家传播思想又得到发展、引申,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文化激进分子所提倡的“全盘西化”既无必要,也行不通。外来文化只有融入民族文化的血液里,才有可能为我所用。我们认为,儒家传播思想经过千百年来冲击与震荡后,经过反省、改造、发掘、翻新,能够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会起积极作用的。

[参 考 文 献]

- [1]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 阮 元. 十三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3] 朱子语类: 卷 4[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4] 荀子简注[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 [5] 汉书. 董仲舒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6] 张隆栋. 大众传播学总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7] 陈独秀. 独秀文存[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

(责任编辑 严 真)

Confucian Concept of Communication: Return and Crossover

BI Wei-ning, GAO Xiang

(1.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2.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BI Wei-ning(1963-),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majoring in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GAO Xiang(1967-), male, post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philosophy and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ain construction of culture tradition in ancient China, confucian concept of communication which has taken a great effect on world and beatified China for several thousands of years is a very important bequest in our ancient thinking storehouses. By this time when people enter the 21st century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oncept of communication which had taken a great effect on the oriental and the western culture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expresses that the cre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concept of communication which has been walking along the communicator body, the acceptor body to the return of communicator body is a logical dialectical procession of negation of negation Facing a new century, we must not only learn the western progressive culture tradition while we must keep up the Chinese nationalities. But also we must introduce Confucianist concept of communication which is a represent of the best culture in China to the whole world so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in the earth can understand and accept them.

Key words: Confucian concept of communication; Eastern and the Western culture; idea of the communication in ancient China